

文学的自然之根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寻根

张守海◎著

WENXUE DE ZIRAN ZHIGEN
SHENGTAI PIPING SHIYUZHONG DE WENXUE XUNGEN

文学的自然之根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寻根

张守海◎著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成果（项目号：14CWXJ25）

WENXUE DE ZIRAN ZHIGEN
SHENGTAI PIPIN CHIYUZHONG DE WENXUE XUNGE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自然之根：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寻根 / 张
守海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 - 7 - 207 - 11556 - 0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5954 号

责任编辑：孙国志

责任校对：秋云平

封面设计：鲲 鹏

文学的自然之根

——生态批评视域中的文学寻根

张守海◎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址 www.hljrcmcb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556 - 0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从“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

——略谈文学的文化之根与自然之根

(代序)

鲁枢元

“寻根文学”发轫于1984年年底由上海文学与杭州市文联在西湖边上召集的那个为期一周的座谈会。那次会议我被邀请参加。会议预定的主题是“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不料，“寻根”却成了会议上的热点与高潮。会后，杭州会议上的这些“寻根者”便把他们在会上的言论整理发表，其中有代表性的是韩少功的《文学的“根”》、郑万隆的《我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李杭育的《理一理我们的“根”》。

作为这场思潮的第一发动者，韩少功在他的《文学的“根”》中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绚丽的楚文化流到哪里去了？”急迫地表露出他对当代文学失根状态的关切。“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这句话后来便成了寻根派文学的一面迎风招展的大纛。

以我的理解，“寻根文学”是以文学创作探寻文学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已经久久失去的“文化之根”。具体到不同的作家，探寻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韩少功在他的那篇文章中也感觉到：“根”，是深埋于一个民族的历史纵深处的。用他的话说，光是寻到“地壳”还不行，还要深入到地壳之下的“岩浆层”。

地壳下面的岩浆会是什么？仍然是文化吗？

后来，我渐渐热衷上研究古斯塔夫·荣格。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与种族无意识学说进一步打开我的眼界，顺着荣格的指引往人类历史的纵深处追寻，去探索人类赖以存续的“根”，我发现那就注定要突破“文化”的藩篱而进入一个新的地层，这个地层，应当就是“自然”！

荣格挖掘出的人类心灵深处的须根，被他归结为种种“原型”，如“阴影”“阿妮玛和阿尼姆斯”“地府母亲”以及“曼荼罗”等，都与人的内在自然性相依相存。荣格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理学很容易与中国古代哲学联系起来，荣格本人也是一个顽固的东方主义者。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然”是“天”，“自然性”即“天性”，“天性”才是人的“真性情”。《庄子·秋水篇》：“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这里的“真”，是本性、天性、自然性，与人工相对，当然也是与“文化”相对的。《庄子·渔父》中又说：“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真”为天、为自然；礼为人事、为文化。“真”与“礼”并不在一个层面上，自然与文化也不在一个层面上。自然应该是一个比文化更幽深、更隐蔽、更丰蕴的层面。

自然，而不是文化，才是人类更悠远、更初始的根。

文学呢？文学艺术与自然的渊源较之文化要更幽深、悠远。我在文艺学的课堂上曾经反复地讲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不会说话时就已经会唱歌，还不怎么会直立行走时就已经会跳舞，没有文字的时候就已经会画画，黑格尔还说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时候已经有了诗、诗的意象。那时，人类可没有这么多的文化！

遗憾的是，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根”原本是深扎在自然之中的。更甚者，为了建造更辉煌的文化，尤其是那些物质文化、技术文化、市场文化，竟然视自然为对手、为敌人，一再向自然开战，一心要征服自然。其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那就是酿成了今天世界性的、代价惨重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

在这样的情况下，生态批评应时而生。

美国当代思想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1933—）说

他自己曾经历了一个“从文化转向自然”的过程，“我的职责是要引导文化去正确地评价我们仍然栖居于其中的自然”。他还曾讲到“文化”“自然”（他常常将其称作“荒野”）与“根”的关系：文化容易使我忘记自然中有着我的根，而在荒野中旅行则会使我又想到这一点。我珍视文化给我提供的通过受教育认识世界的机会，但这还不够：我也珍视荒野，因为在历史上是荒野产生了我，而且现在荒野代表的生态过程也还在造就着我。想到我们遗传上的根，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体验，而荒野正能迫使我们想到这一点。

澳大利亚生态批评家凯特·瑞格比（Kate Rigby）对于现代文学理论界长期忽略“自然”的现状表示极大不满：对文学文本的研究竟伴随着对土地的忘却……现代文学批评只是在19世纪早期才得以学院化为一种学术研究，而那正是“自然”与“人文”科学开始被生硬割裂开来的时期。

伴随着生态危机的阴影而日益临近的生态时代，“寻根文学”的文学也应当进一步寻一寻自己的根。“文学寻根”不仅要寻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还要寻找文化之下更深层的“自然”，那才是文学之根更原生态的、更丰饶的土壤。套一句30年前韩少功说过的话：“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天地自然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

与“寻根文学”不同，新时代的“文学寻根”不但要寻回文学艺术这棵大树久久失去的“自然之根”，同时还要反馈自然的养育之恩，发挥文学的精神感召力，在地球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为自然招魂，以女娲补天的大爱修补日趋崩溃的自然生态系统。

怀着“绿叶对根的情意”，数年前我所指导的一位博士生、烟台大学文学院青年教师张守海，开始了他对文学之根的探寻，其结果便是他的那篇洋洋洒洒写了近20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文学的自然之根——生态视域中的文学寻根》。守海博士在他论文中开章明义地写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韩少功、李陀等人发起的文学寻根，面对的时代问题是“文化断裂”，目标是通过文学创作深入到民族文化的深层，寻觅文学的文化资源。而当前我们面对的问

题是由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急剧恶化。因此，本文的目的将指向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所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自然”实则应是人类文学之“根系”中更深远也更为“根本”的“根”。文学不只是人学，同时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我们希望，通过对文学的自然之根的探寻，能为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提供某些参照，进而为现代人走出生态困境，为当代文学走出生存危机多少做出一点贡献。

守海的论文旁征博引、左右开弓，其文字尚嫌青涩，用语时见唐突，但毕竟是怀着年轻人的一腔热血，从韩少功、李陀、钟阿城、郑万隆等前辈手中拿下“接力棒”，踏上了由“寻根文学”到“文学寻根”的漫漫征途。

附注：以上是我多年前发表在《文艺争鸣》上的一篇文章，文中曾谈到守海博士的这部书稿。文学的寻根由追寻文化之根最终寻找到自然中来，这应是守海对于文学理论，尤其是生态文学批评的一份贡献。对于自己的观点，守海是执着的，记得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他甚至不惮于与到会的专家学者发生争论。我认为守海的努力是开启了一个领域的问题，而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并不轻松。在生态运动方兴未艾的当下，这也仅仅才是开始。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文学的这一潜在的根本性问题。

2018年10月30日·独墅湖畔

目 录

导 论 重寻文学的自然之根	(1)
一、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与自然的“复魅”	(1)
二、文学的“生命文化”属性与文学界对自然的漠视	(8)
三、为文学寻找其自然之根的意义	(13)
第一章 地球生态危机与文学终结论	(20)
第一节 生态危机的成因与表现	(21)
一、生态危机的成因	(21)
二、生态危机的表现	(33)
第二节 “文学终结论”的缘起	(39)
一、“文学终结论”的主要观点	(39)
二、“文学终结论”出现的内在成因	(44)
第三节 有根的文学是不会终结的	(48)
第二章 自然作为文学之根	(54)
第一节 自然观的历史谱系	(54)
一、古代活力论自然观：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	(55)
二、近代机械论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分裂与自然之死	(59)
三、当代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63)
第二节 文学艺术扎根于自然的土壤	(71)
一、文学起源时期与自然的关系及早期文学的自然观	(72)

二、作家的“生态位”与文学	(75)
三、自然对艺术想象力与语言表现力的滋养	(84)
第三节 自然之道与文学之道	(87)
一、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自然本体论	(88)
第三章 文学的失根状态	(112)
第一节 自然生态的恶化与诗情的枯竭	(113)
一、自然生态的恶化与天地大美的消逝	(113)
二、自然生态的恶化与艺术创造力的衰退	(118)
第二节 精神生态的恶化与诗意生存的消解	(125)
一、消费主义对文学的自然之根的戕害	(126)
二、技术主义对文学的自然之根的伤害	(137)
三、诗情的消解与文学的虚无主义趋向	(144)
第三节 文学活动对自然之道的背离	(151)
一、脱离自然之道的科学主义文学观念	(152)
二、工具理性主义支配下漠视自然的文学创作	(158)
第四章 文学之根的培护与生态批评	(161)
第一节 生态运动：文学之根的培护	(161)
一、生态理论的建构：走向深层生态学	(161)
二、生态实践的深入发展：从政府到民间	(172)
第二节 当代文学艺术的生态转向	(175)
第三节 当代文学批评的生态转向	(185)
第五章 文学的自救与救赎	(190)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自救：返本归真	(190)
一、文学自救的必要性	(190)
二、文学的自救之路：返本归真	(193)
第二节 文学艺术的救赎：恢宏的弱效应	(197)
一、需要救赎的是什么——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家园	(197)

二、文学的救赎是可能的吗——确立对精神的信念	(202)
三、文学的救赎之路——以诗性智慧和悲悯情怀照亮未来	
.....	(206)
结语	(214)
参考文献	(218)
后记	(229)

题记：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老子》第十六章

导 论

重寻文学的自然之根

在现代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向的背景下，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还自然之魅”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主张。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为自然“复魅”并不是重新把自然“神化”，而是恢复对自然的敬畏，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讲也就是“生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文学不但是“人学”，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学”，是构建“生命文化”的主力军。现代社会的文学界，从作家创作到理论研究普遍存在着漠视自然的情况，而文学终结论的推出，表明文学自身也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在此种情况下探寻文学的根是非常必要的。文学是有生命的，拥有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文学的根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寻根只为文学寻找文化之根，还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生态学时代有必要重寻文学的自然之根。

一、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与自然的“复魅”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生态危机这个可怕的幽灵开始在全世界徘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逐渐认识到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了大量补救措施，但“局部改善，总体恶化”却仍然是当下全球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生态问题研究者一般认为，二十世纪发生了两次大的生态危机。第一次是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普遍面临的环境

问题，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等。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如英国的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水俣病事件等，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和病痛。面对这些问题，西方工业国家制定了许多环保政策，全力治理污染，减少公害事件的发生，一些城市的环境问题也得到了局部的解决。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又产生了第二次生态危机。与第一次危机相比，第二次生态危机的特点主要有：1. 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演变为全球危机。2. 资源短缺问题开始凸显。3. 人口暴增。4. 全球生态系统遭到全面破坏，生命之网日渐蜕变为死亡之网。^① 总之，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看，第二次生态危机都比第一次严重得多。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已经对人类生存的地球母体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对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来说，更无异于釜底抽薪。在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中国的生态问题尤其严重，正如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所说：“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取得了西方 100 多年的经济成果，而西方 100 多年的环境污染在中国 30 年间集中体现”，“中国如果继续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②

在这场千古未遇的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人类文明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杨通进先生认为，过去 50 多年环境保护的历史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实给了人类一个很大教训，那就是：“环境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工业文明的基本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了，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必然产物。在工业文明的基本框架内，环境危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③ 现代工业文明的脆弱和危险之处在于，它过多地依赖消耗地球资源，并制造环境污染，当地球的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时，这种文明的发展也就无以为继了，而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却是难以消除的。身处工业文明发祥地的西方学者更早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投入了新的道路的探索中。从

① 参见杨通进主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导论第 4 页。

② 潘岳：《中华传统与生态文明》，载《经济观察报》，2008 年 12 月 22 日第 16 版。

③ 杨通进主编：《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重庆出版社 2007 年版，总序第 4 页。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以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学者、政治家，以及各界民间人士就开始投入生态运动之中，拉开了“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向”的序幕。而今，声势浩大的生态运动已在全世界兴起，生态文明正在成为继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范式，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领域：保护生物多样性、治理大气和水污染、降低能源消耗、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美丽世界等各种措施不断推出，官方和民间举办的各种涉及环境问题的会议也在不断提出新的环保理念并推动实施。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也带来了交叉学科的繁荣：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法学以及深层生态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日益兴盛的生态运动也推动人类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出现了根本的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开始向生态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转变，“后现代是生态学时代”的观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人类的自然观已经发生了积极的转变，自然重新成为人类关爱、敬畏乃至信仰的对象，成为文化关注的中心。所有生态运动的目的归结到最后，就是希望改变人类与自然严重对立的局面，尊重自然的价值，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营造美好的生存家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的人类长久福祉。

在人类早期的自然观中，自然被视为生命之源，万物都有自身的守护神，人类在使用自然之物时需要通过向守护神祷告的方式与自然沟通，请求守护神的允许，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的思想。但是随着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大发展，随着人类自然观从原始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时期的发展演变，人类发现了新的物质力量及其在时空中的各种组合和天体运动，自然的法则和内容发生了改变，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不再是一个神秘的存在，一切都变成了新的现实，于是原有的万物有灵的生命整体观逐渐被人们抛在脑后。自然在人类文化中变成了一个沉默的客体、一个仅供人类满足自身需要的工具，因此人类对自然的破坏才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生态文明必须走出机械论的自然观，走向生态整体主义的自然观，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需要

借鉴前现代的活力论自然观，因为古代万物有灵论敬畏大自然的做法，可以为我们反思现代工具理性控制下的征服自然的思想提供一种有益的启迪。生态主义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然的“复魅”是建构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所需要的，法国著名思想家、生态运动的先驱塞尔日·莫斯科维奇明确提出了“还自然之魅”的主张。莫斯科维奇认为，“现代文明诞生于机械学与机械精神的结合”，^①它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对自然世界的“去魅”，所以生态主义运动必须“还自然之魅”，那么生态主义者所说的“还自然之魅”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莫斯科维奇认为：

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的魅力。当我们努力捍卫自然时，我们也在试图拯救生命。显然，我应当早些提及这一点，但我没找到机会。从思辨的角度来讲，物理学或许象征着一种死亡文化，而生物学则代表着生命文化。^②

莫斯科维奇在这里强调“自然的魅力”正是来自于生命的魅力，那么“还自然之魅”也就是把自然的生命属性还给大自然，还大自然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知道大自然本身的生命属性从来没有消失，自然的“去魅”主要是人类的文化观念出了问题，为自然“复魅”首先要对文化观念上恢复对自然生命的敬畏。为此莫斯科维奇提出了“生命文化”与“死亡文化”这样一对对立的范畴，是很有启示意义的。生态主义者讲的为自然“复魅”并不是重新把自然“神化”，而是恢复自然原本就具有的生命属性，从文化观念的角度讲也就是“生命文化”的复兴与重建。^③诚然，人类因其文化创造而区别于自然，但是人类的文化创造不能走向自然的反面，而必须顺应自然。我认为莫斯科维奇所说的“生命文化”就是肯定自然的生命属性、遵从自然法则、顺应

^①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1页。

^② [法] 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页。

^③ 与“生命文化”相近的是“生态文化”，但“生态文化”概念相对泛化。本书将“生命文化”作为一个核心范畴，因为生态的核心就是生命，而用“生命文化”与“死亡文化”相对，对于揭示文化危机与生态危机（核心也是生命危机）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阐释张力。

天地之道的“顺自然”的文化；“死亡文化”就是把自然看成是机械的物质构造，把自然作为征服和改造的对象，甚至以自然为敌的“逆自然”的文化。就自然科学领域而言，死亡文化以近代物理学为代表，而生命文化以当代生物学为代表。“死亡文化”导致了自然之死，而“生命文化”则要为自然“复魅”，把自然的生命属性还给自然。我国生态批评的开拓者鲁枢元先生通过对人类知识系统变迁轨迹的考察指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大体上有这样三种知识系统：神学的知识系统、物理学的知识系统、生物学的知识系统。”^① 现在正在由物理学的时代转向以生物学为基础的生态学的时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三种知识系统的解释是大不一样的，生态学时代最尊重自然作为生命系统的内在价值，并力图为自然“复魅”。因为自然的魅力来自生命，所以为自然“复魅”的核心也就是恢复自然原本具有的生命属性。现代主流文化之所以异化为“死亡文化”，正因为它本质上就是鼓吹通过技术手段和商业运作来控制和掠夺自然，满足人类无止境的物质享受的文化，它最终带来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导致社会发展无以为继。生态文明所呼唤的文化必然是“生命文化”，只有走向生命，才能真正从深层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看作一个生命有机整体。

如果继续向前追溯西方世界关于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统治自然是正确的”。^② 即使在世界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只是修改一下人类统治自然的理由，而统治自然的原则没有变化，统治自然的原则可以是基于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是以科学为基础。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每个物种都为了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斗争，而人类进化成了生态系统的统治者；赫胥黎的“天演论”也同样要求人类同自然做斗争；弗洛伊德对人类进行心理分析，认为人类形成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征服令人恐惧的自然；马克思则把自然视为一个“正”，把文化看作是自然的“反”，人类通过劳动把价值加于无价值的自然，最终形成一个“合”，即自然成为人化的自然。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征服自然的观念，是基于西方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①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②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4页。

认识，正如罗尔斯顿所说：“西方文化的天才性有很大一部分却在于人与自然的不连续性的观念。这是由希伯来人和希腊人在我们心中唤醒了的观念，而在近代科学中达到了极致。”^①这种观念导致西方工具理性主义片面发展，社会主流文化异化成为逆自然的“死亡文化”。在这种以物理学的机械精神为内核的“死亡文化”指导下，人类活动最终将导致自然的终结，也导致人类文明面临危机。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断有反对的声音，浪漫主义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就曾掀起过对现代性反思的第一次高潮。二十一世纪的人类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使命，必须更彻底地反省以征服和统治自然为原则的“死亡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全球性的生态文明转向也是延续浪漫主义思想的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文化选择。莫斯科维奇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曾讲到：“在千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在迅速传播，我们的重心正在从社会转向自然，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同时创造社会与自然的历史，因为自然是社会历史的基础。”^②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在探讨后现代文化时，也曾提出应该以“生命模式”为导向的后现代文化取代“技术模式”为导向的现代文化，^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走出西方现代社会面临的严重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科斯洛夫斯基通过对“文化”的词源的考察发现，文化在拉丁文中的词根的本义，就是培育的意思，如动物的培育，灵魂的培育，等等。文化在其本意上同耕种、养殖的农业有关。文化是对某种尚无人时就已存在的东西（如植物、动物）的培育。我国学者范进通过考证发现，“文化”一词在西方最初源于拉丁文“Cultura”，含义是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使之满足人的生存过程中，对土地的耕耘、加工和改良，以及植物的栽培。范进还发现：“当文化一词产生时，就有个孪生姐妹似的对置词，自然（Nature）概念。所谓‘自然’一词，就像在欧洲各种语言中同时意味‘本性’一样，它不仅指存在人身之外与人相对立的外在自然，同时也指存在人身之内的各种性质（诸如本能、欲望、情感、理性等）的内在

① [美]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哲学走向荒野》，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3页。

② [法]塞尔日·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0页。

③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自然。在这一意义上与自然相对立的文化概念，逐渐由对大地进行加工而赋予新生命的‘耕作’这种原初观念，引申到对人的内在自然的肉体和精神的训练、培养、教育，尤其是指知识的获取、道德能力和艺术能力的形成，以及体魄的强化和锻炼等；后一种文化还包括培养人们遵守社会准则和习惯的能力，也包括勉励人们遵守这些准则和习惯的愿望和要求。”^①

可见，文化在其本源意义上就是具有生命属性的，它与自然血肉相连，人类在从自然走向文化的过程中，不能割裂与自然生命的关系，否则人类文化就是失去生命根基的文化，这样的文化将会把人类引向危险乃至死亡的境地。今天世界性的精神空虚与自然生态恶化从深层来看都与文化与自然生命的割裂有关。科斯洛夫斯基所呼唤的“生命模式”为导向的后现代文化与莫斯科维奇所讲的“生命文化”都是强调文化要亲近自然，恢复原本的“培育”生命的意义。美国著名学者、建设性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格里芬也曾指出，确立人与自然一体化的后现代观念非常重要而紧迫：“这种后现代宇宙观的正式条件包括人类，实际上作为一个生命整体，重新纳入到自然中来，同时，不仅将各种生命当成我们目的的手段，而且当作它们自身的目的。”^②“尽管直至最近，‘现代’一词还几乎总是被用作赞誉之词或是‘当代’的同义词，但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逃毁灭的命运。”^③毫不夸张地说，我们面临着生死抉择，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活路，是诗意栖居之路；一条是死路，死无葬身之地。二十世纪生态运动的先驱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描绘了一幅死亡般寂静的春天的景象，她以此警示人们，现代社会的生态污染最终将导致地球生态系统从“生命之网”蜕变为“死亡之网”。人类在后现代社会要实现地球生态系统从“死亡之网”到“生命之网”的转变，就必须实现人类社会从“技术——消费模式”到“生命——诗意”的转变，为此首先要变革

① 范进：《康德文化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0—21页。

② [美]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③ [美]格里芬：《后现代科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英文版序言。